

# “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中国路径” 学术笔谈

《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

[主编按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2021年9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在城乡建设中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立足新时代，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使命”的必由之路。

六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城镇保护与规划的先行者、城市建设史和城乡遗产保护学科奠基人之一的阮仪三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实践与教学工作，并因这方面的卓越贡献两次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奖项。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激发中青年学者传承老一辈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的责任感及使命感，更好地促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创新发展，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于2023年10月29日在上海隆重举行了“阮仪三教授城市保护学术思想研讨会暨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中国路径国际论坛”。

本刊编辑部将与会专家的发言整理集结为“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中国路径”及“阮仪三教授城市保护学术思想”学术笔谈，总结凝练为以下四个主要议题：

## (1) 文脉传承与基因延续

段进指出传承城市空间文脉，通过空间基因延续空间要素的稳定组织关系和深层机制，需要努力探索形式背后的生成逻辑和科学内核；周俭从“城乡活态文化遗产保护”学术思想出发，提出要关注居民的需求，深入理解不同地方的历史文化价值特征和内涵，把历史资源的发掘与日常社会经济行动有效结合；李晓江强调了阮仪三先生的城市有机更新理念，认为文化之于城市不是锦上添花、好中做优，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

## (2) 保护与开发

常青提出保护是管控变化，而不是阻止进化，要把保护的类型和质量放在规模和数量扩大之上，既要守住保护的底线又要以传承和再生作为出发点；王建国认为应该“精细保护”，注重不同历史文化保护对象中的不同“颗粒度”，注意“尺度效应”，进一步提出了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师与社会资本开展有边界的合作，与利益相关人协商项目操作实施的共赢模式；伍江则表达了自己对城市更新过程的实践困惑与反思，城市单体建筑的价值与城市整体历史景观的价值究竟如何判定？对于历史遗存改造和活化利用有无底线？适应性更新的底线是什么？

## (3) 遗产智化

王建国强调要科学保护，采用新兴数字技术探索城市形态“一果多因”的建构肌理；伍江重点关注技术创新在规划设计方法、施工建造技术、材料修复技术、安全监测技术等方面的应用与突破；张兵则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的建设基础上指出，可以通过与调查、审批、土地供应、执法督察、不动产登记等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推动遗产保护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 (4) 政策导向与机制创新

张兵提出应该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全域全要素统筹的积极作用，充分运用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政策手段，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践中盘活存量；伍江则认为面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性转型，现有的法规体系、标准、规范和管理体制都亟待随之转变，探索建立新的市场激励机制已经成为克服当下建成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适应性改造和活化利用瓶颈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

阮仪三先生坚守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和保护事业，“仪三精神”激励培养了一代代学者，其古城保护理念、工法和方法更是为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中国路径注入精髓。与会专家们的观点不仅揭示了他们对遗产保护领域的多元视角和深刻认识，也反映了他们对“仪三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我们期待这些洞见能够激发更多创新思考，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协调共生。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任重而道远

伍江（同济大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学院院长，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人类迄今为止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历经自然损毁、人为破坏，遗存至今，实为珍贵。面对中国快速城镇化，本应得到格外呵护的中国城乡建成类遗产，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破坏局面。尤其是相当多数量的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遗产，常常因为同时面临着改善民生的压力而不得不陷入拆或留的困境。强大的房地产市场，更是觊觎土地资源再开发的巨大利益而将其最终推向毁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以阮仪三教授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勇敢地挺身而出，为让这些历经天灾人祸而保留下的宝贵遗产能够继续保留下去、传给后代，竭力抗争，留下了“古城卫士”的美名。平遥、丽江古城，周庄、同里古镇等一大批历史遗存在阮先生等人的守卫下得以保留下来并成为世界瞩目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我们也要看到，更多的历史遗存因为阮先生等“卫士”的力所不及而永远消失，还有更多的珍贵历史遗存至今仍面临被损毁的危险。阮先生耄耋之年还奋笔上书，力挽狂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将“卫士”的接力棒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唯有此，人类的文明之光才会散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光芒。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持续不断地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要让全社会认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传承历史、延续文明、弘扬文化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城乡建成类历史文化遗产不同于其他遗产，更不同于博物馆里收藏的文物。城乡建成类遗产不可能被封闭在玻璃罩子里，在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同时，还应该继续承担着当代生产生活的功能。也就是说，建成类遗产的绝大部分都必须继续“活”在当下。完全失去使用功能的城乡遗产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加快其自身的自然损毁。因此在城乡建成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就必须面对活化利用问题。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是我们做好保护工作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古城是与发展现代化相一致的，应该把古城的保护、建设和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目前在保护工作中特别需要进行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

所谓理论创新，即是要不断深入挖掘历史遗存的价值，建立起完整的保护价值体系。尽管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早就明确了历史、科学和艺术三大普遍价值，但在具体的保护个案中存在着认识的千差万别，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等其他方面的实际需求都会影响甚至限制我们对于价值的判断。比如在对于建筑单体“原真性”的讨论逐步形成共识以后，我们对于城市整体空间结构与空间肌理的原真性却几乎完全没有认识。城市单体建筑的价值与城市整体历史景观的价值究竟如何判定？对于历史遗存改造和活化利用有无底线？适应性更新的底线是什么？等等，都亟须学术界理论界的

新成果。

所谓技术创新，即是在规划设计方法、施工建造技术、材料修复技术、安全监测技术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突破。我国几十年来大规模快速城镇化推动了建造技术的突飞猛进，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但针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更新利用的技术仍极为缺乏，可供选择的技术极为有限，专业实验平台少而又少，专业人才凤毛麟角。即使出现突破性成果，也因其造价昂贵而让人望而却步，因市场有限而无人问津，更因对保护的忽视而束之高阁。与此同时，传统建造技艺也青黄不接。城乡建成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适应性更新改造亟须专业界不断推出新成果予以充分技术支持。

所谓机制创新，即是面对我国快速大规模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性转型，原有的规划建设制度亟须向“规划-建设-运维管理”一体化的全周期城市治理体制转变。城乡建设从“拆改留、以拆为主”转向“留改拆、以留为主”，现有的法规体系、标准、规范和管理体制都亟须随之转变。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适应于大规模城市改造建设的房地产模式也亟须转向适宜于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的新市场模式转变。事实上，机制改革与创新，探索建立新的市场激励机制已经成为克服当下建成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适应性改造和活化利用瓶颈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

致敬阮仪三先生兼谈关于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几点认识

王建国（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阮先生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中国历史城市保护的先行者和著名专家、我非常敬重的师长前辈和学界楷模，也是多年“忘年之交”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到阮先生，印象中是在苏州研讨古城保护相关规划设计工作，其时阮先生带了位优秀的博士生参加，其间我聆听了阮先生关于苏州古城历史保护的重要观点和研究成果介绍。当时我在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工作，作为苏州古城特邀顾问齐康院士的助手参加了会议。其后，我多次应邀参加阮先生及王景慧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和答辩，这些论文选题都是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方法和法律法规建设的内容，对于当时对名城保护意义和学术价值尚一知半解的我，是学习阮先生及其团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学术思想的极好机会，他指导的博士和团队合作成员很多后来都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专家，是今天城镇历史保护领域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支学术力量。

在认识阮先生之前，我已经通过《中国城市建设史》教材和《城市规划汇刊》上的论文，初步学习过他早年的一系列古城历史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论文的精华。改革开放和中国疾风暴雨式的城市化进程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和经济腾飞的进程，取得世所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此进程中，经济发展优先和工业化、标准化、批量化的城镇扩张发展方式也给我们的历史城市、历史城镇和乡村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带来某种意义上说是“釜底抽薪”式的破坏和负面冲击。于是，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挺身而出，加入了名城名镇及大量性的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



“守卫者”的队伍中，他们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中的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促使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诞生，以及一系列历史文化街区、城区和地段保护制度、规范条例和实践探索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这些工作有效遏制了当时中国城市非常普遍的“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激进式发展扩张，其中，阮先生就是最有代表性和最为杰出的学者之一。今天，我们之所以仍然能够完整看到并体验到苏州、扬州、丽江、平遥和江南环太湖等诸多历史名镇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风采，是与阮先生多年来呕心沥血致力于历史城镇保护的理想守望、学术坚守和保护实践密不可分的。阮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方面的学术造诣和理论方法实践成果获得了国内外的崇高赞誉，曾经获得过一系列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等在内的国内外重要奖项，在业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持续影响。当今天探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的事业和成就时，我们最先能够想到的就是阮先生的贡献和成就，高山仰止。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首次提出系统完整保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从空间范畴、时间跨度、体制机制等多维度体现了新时期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新要求。今天的历史文化保护的范畴、对象和尺度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扩展，如尺度和范围已经拓展到国家文化公园、国土空间、遗产对象需要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结合等。在城市尺度上，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行动结合可能是中国城镇化下半程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命题之一。个人认为，在很多场景中，历史文化保护都是城市更新的前提，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而言。

在此，我简要谈一点关于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认识。

一是科学保护。就是要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找准历史文化保护中的共性科学问题，积极开放并有针对性地运用新科技，特别是新兴的各类数字技术，探索城市形态“一果多因”的建构机理，并将物质和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等量齐观。

二是精细保护。就是注重不同历史文化保护对象中的不同“颗粒度”，注意“尺度效应”，用“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保护工作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应对对象属性制宜的精细化水平，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

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说，规划师、建筑师和设计师要积极介入项目的策划、投资和运维管理，与社会资本开展有边界的合作，与利益相关人协商项目操作实施，同向发力，正和多赢，真正实现城市共建共享、共治共管。

四是历史文化保护要与规划长效管理相结合。通过历史文化保护的社会共识，积极将设计成果参与到城市空间治理和人居环境品质的提升优化和管理中。

城市的本质属性是荟萃、并存和拼贴。历史城市、历史城区、历史街区建筑保护和城市更新肩负着重建城市社区人文场

所的使命，数字虚拟世界虽可部分重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认知，但那些沐浴在真实的空气、阳光、绿荫环境中，饱含历史信息、文化底蕴、岁月包浆的城市、街道和建筑对于人们具身在场的体验，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作为阮先生晚辈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同道学者，我对阮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再次表示由衷的钦佩和祝贺。

### 阮仪三城镇保护思想的学习与发展：历史文脉传承的中国路径 段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历史文脉传承是当代城市发展中的关键课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2021年“十四五”规划提到“保护和延续城市文脉……让城市留下记忆、让居民记住乡愁”。城市历史文脉传承对于实现中国城市文化多样性具有重大意义，并上升为国家层面所需解决的重大战略。我国学者为解决当代城市发展中历史文脉断裂这一难题，在理论与方法层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阮仪三先生作为中国著名的古城保护专家，五十多年来坚持工作在一线，为中国历史城镇与建筑保护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曾主持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规划，挽救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建筑，助力平遥、丽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阮先生提出历史文化保护的“四原则”，即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永续性，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思想。他所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保护理念也成为当今学界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问题的普遍共识。

2500多年的苏州古城是我国历史文脉保护与发展的缩影，充分展示了苏州独有的地域文化与景观风貌。阮先生从1958年就开始了苏州古城的研究工作，自1980年代起做了许多有关苏州古城的保护规划，极大改善了苏州古城的整体面貌。我曾于1990年代和阮先生合作开展“苏州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并负责“7、8、9、15、23号街坊”控规编制的具体工作，在此期间与阮先生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与探讨，阮先生的“可持续保护”战略思想，为我们团队创新性提出“城市风貌综合评价系统”和“图、文、指标合一的分图则导控方法”提供了启示。2001年，我带领团队在苏州“环古城风貌保护工程概念规划”全国方案竞赛中取得优胜，随后又主持参与了“环古城风貌保护工程西段详细规划”项目。环古城地区作为苏州古城整体形态的重要载体，也是现代城市发展中新、老城的过渡协调区域，在城市急剧扩张的时代，面临着整体构架破碎、环境品质堪忧、交通压力剧增、设施配套不足、文化氛围丧失等现实问题。我和团队通过把控“四角山水”的城市格局、“城中园、园中城”的人工与自然关系、“水陆双棋盘”的城水关系等空间组合模式，延续了“金阊十里，姑苏水城”的历史文脉和传统风貌，改善了古城人居环境，最终得到了包括阮仪三先生、贝聿铭大师在内的国内外多位专家认可。通过对苏州古城的持续研究，我们发现将古城中的空间基因控制好了，苏州的整体特色就能延续，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需求进行发展、演绎。

这种方法也与阮先生一直强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做到“四性五原则”的思想具有共通之处。

中国古代在传统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方面有着丰富积累,简单套用西方城市设计方法无法解决新时代城市空间的文脉传承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并得以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营城的空间基因。我带领团队对空间基因系列研究长达二十多年,从中发现,传承城市空间文脉,只有通过空间基因延续空间要素的稳定组织关系和深层机制,才能在城市空间形塑中实现其“形意相生”的内涵。空间基因关注的,不是简单塑造一种形式或风貌,而是努力探索形式背后的生成逻辑和科学内核,这正是新时代中国路径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系统性思考。空间基因一方面承载不同地域特有的“城市空间-自然环境-社会人文”互动演化模式的空间信息,另一方面促进优化和涌现新的空间稳定模式,进而控制和影响着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化与发展。在城市空间文脉保护发展过程中,空间基因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空间标识,包括空间结构、空间肌理、空间尺度等,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城市空间文脉传承与发展的中国路径。

### 基于进化的历史保护观

#### 常青(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阮仪三先生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上给予我极大帮助和深远影响,首先回忆阮先生鼎力鼓励和襄助自己从事历史环境保护与再生的两件往事。

一件事发生在上海。在外滩源联合教堂的对面,有一座建于20世纪初的濒河历史地标——“划船俱乐部”(Rowing Club),由中央的俱乐部阁楼、西翼的泳馆和东翼的船库组成。船库早已拆改为警署,泳馆和俱乐部阁楼虽经改造,但原建筑还部分存在,特别是泳馆曾训练过多位奥运游泳冠军。我十多年前曾率团队做了依照历史图纸复原设计和新旧共生创意设计的两套方案。然而对于这样一座虽有历史纪念价值却无保护身份的建筑,去留在当时是存在争议的,眼见着就要面临被彻底拆除的命运。最后时刻我拜请阮先生出面相救。在了解到划船俱乐部的历史和现状情况后,阮先生毅然提笔上书市领导陈情,终于保住了这座历史地标的残剩部分。这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作为,阮先生一如既往地践行着他毕生坚守的文化遗产保护价值观。

另一件事发生在海南。在海口骑楼老街区边缘,濒临着海甸溪方向的长堤路沿线地块,大部分骑楼早已销声匿迹,低质改建比例高,1990年代以来拆改的建筑大多品质低下,风格杂陈,风貌缺失,城市景观形象不佳,活力和场所感亦阙如。我从2010年起,接受海口方面委托,主持了长堤路沿线骑楼老街北缘地块的再生设计,摈弃仿古守旧思路,采用新旧共生、和而不同的设计理念和策略,完成了存旧续新的“骑楼外滩”创意设计,摆正了街区内外骑楼街的时空演进关系,得到了

阮仪三先生及住建部王景慧和清华大学张杰等国家一流专家的肯定。特别是阮先生,极力要求抢救性修复残存的几栋老骑楼,同时也对新骑楼设计给予了有力支持,表明了对保护和发展关系的立场和开明睿智。该方案通过评审逾十载,直到最近才在国家“守正创新”的导向感召下重启,既展现了同济两代人在建成遗产价值观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也为以再生(regeneration)为实质的新一轮城市更新提供了实验性的参考范式。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得到阮仪三先生及其团队支持的杭州长河镇“来氏聚落”再生规划设计,这一成果获得了瑞士国际首届Holcim可持续建筑大奖赛亚太区金奖。我们在设计研究之初提出了对来氏聚落再生应“延续地志、保持地脉、保留地标”及新旧拼贴、和谐共生的规划理念和设计策略,而不是把一个历史村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毕竟保护的多样性有别于单一的保存。因受到人工干预的地貌,存在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规划设计中用了两个中国的概念——“地脉”和“地志”来指代山形水势及其演变印痕,其实质是对史地维度环境变迁(changes of historic and geographic context)的认知和把握,以此为前提展开来氏聚落的再生规划设计。尽管这一规划设计成果的大部分因种种原因尚未充分实施,但却促成了其成为杭州十大历史文化街区之一,为其渐进式、可持续的保护与再生奠定了发展基础。

保护是管控变化,而不是阻止进化。冯纪忠先生提倡“整旧如故”“与古为新”以及阮仪三先生不遗余力对之推广和拓展,深刻地影响了全国的保护与再生领域。当前在国内建成遗产保护与历史环境再生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国家倡导“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保护发展观已开始渐入人心,保护与再生的理念、方法和解决途径期待新的探索与突破。

为此,对新型的城市更新中的挑战提出两点对策:第一,要把保护的类型和质量放在规模和数量扩大之上。第二,既要守住保护的底线又要以传承和再生作为出发点。

在新型的城市更新中,建设者、投资者和设计者要在保留、改建、翻建、添建以及确定可以拼贴共生的新旧要素等问题上达成共识,积极倡导一案一议,对症下药,务求为保护与再生找到得体的策略选择和解决途径。

### 守护城市历史遗产,传承城市文化精神

#### 李晓江(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1982年初,我开始读董鉴泓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阮仪三先生多年跟随董先生研究中国城市历史,自然成了我学业的重要引路人。遗憾的是毕业以后再无机缘深入参与城市历史研究和保护工作,难以系统准确学习、评价阮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但在同济求学阶段与阮先生密切交往中得到的教导、帮助和关爱已让我受用终身。

1982年暑期,阮先生带着我考察陕北晋中地区古城。整个暑期我们从西安出发,经铜川到黄陵,再到延安、绥德、米脂、



榆林、靖边，从佳县坐木船渡黄河，再到兴县、岚县、忻州。在太原与阮先生分手后，我独自去平遥调研。在平遥刚好遇到郑孝燮、余庆康两位先生，有幸跟随他们在平遥古城考察了三天，也不断听到两位先生和当地干部对阮先生抢救古城的欣赏和赞誉。

1980年代初的北方地区还很贫穷落后，交通食宿条件很差，颠簸的公路，时速仅30—40 km的长途汽车，多人一间简陋的招待所，路边尘土飞扬的食铺……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阮先生的专业热情和工作态度。一路上阮先生都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历史，讲文化，讲调研方法，讲文献阅读……每到一城市找图书馆查史料，找文管会看文物，找老人聊历史、听典故。在佳县，我们被黄河边上选址精妙、布局独特、形态优美的香炉寺、白云观深深感动。没有可用的测绘图，我们就利用太阳光影，用步测、目测绘制了两处平面图，调研报告及测绘图后来发表在《城市规划汇刊》。

1983年暑期，我和孙安军随阮先生考察了东北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在俄、日占时期的规划建设，考察了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兴城（宁远城）、秦皇岛。这次考察使我认识到研究中国城市近现代城市建设、规划的重要性，这个时期是中国城市从古代走向现代的重要转折期，既有着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和营城理念的深深烙印，又充满了走向现代过程中的种种探索与尝试。近现代城市历史的研究是认识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领域。这次考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太湖流域城市近现代历史。

阮仪三先生用一生的精力奋斗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和保护事业中，他的执着、坚持和坚韧守护了平遥，守护了水乡古镇，守护了诸多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让每一位有文化责任感的规划师感动，也获得了相关政府官员的尊敬。在我的印象中，阮仪三先生和中规院原总规划师王景慧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为国家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事业做出努力最多、贡献最大的学者和前辈。可惜王景慧先生过早离世，而阮仪三先生如堂吉珂德般用骑士精神坚守着历史文化保护阵地，坚持到现今——我国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最好的时代！前辈们倾一生心血守护城市历史遗产，传承城市文化的精神，也让我们更加明白文化之于城市不是锦上添花、好中做优，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

2022年阮仪三先生在耄耋之年为上海700多万平方米的二级旧式里弄的建筑保护再次上书高层，使上海历史城区内大量近代、当代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对上海的城市文化保护和传承功莫大焉，也直接助推了“留、改、拆，以留改为主”的城市有机更新理念在全国推广。师从董鉴泓先生、阮仪三先生，我学到的是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对事业和责任的担当。我常说，做规划师，有理想很艰难，没有理想更艰难。

阮仪三先生对文化、对城市、对历史的爱和对人、对学生的爱是高度一致的。阮仪三老师的家是学生们随时可以推门而入的，阮仪三先生和夫人孙老师曾经照顾过不少生病的外地学生。阮仪三先生和孙老师为我在同济新村教工俱乐部举办了校

园婚礼，阮仪三先生亲自动手帮我把我硕士学位论文改写成三篇学术论文，连载在《城市规划汇刊》上。先生的恩泽让我终身铭记。

理论为基，因地制宜，创新实践，与时俱进——阮仪三先生的学术思想对我国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周俭（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分会副主任委员）

### 1、与时俱进的城乡活态遗产保护理论

阮仪三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保护古城，建设新区”的名城保护策略，在当时我国城市快速发展初期，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免遭破坏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平遥古城、苏州古城、潮州古城等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因为运用这样的策略得以完整留存至今，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典型案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中，针对古镇如何发展阮仪三先生提出了“发展旅游、致富居民、振兴经济”的保护与发展并重的理念，使著名的“江南六镇”充分借助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了发展转型。

随着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针对保护中出现的假古董、大量搬迁原住民、商业化过度等问题，阮仪三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永续性”原则，强调活态文化遗产的价值保护和环境保护，重视其“生活性”的延续，引发了学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性的讨论，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城乡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21世纪以来，阮仪三先生将国际的保护方法、各国的保护机制和法律法规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诸多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规划中应用实践。日本的“修景”方法和对木构建筑的保护方式、法国的“保护区”制度和“整体保护”的思想与方法等等，都被借鉴到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中。

### 2、因地制宜的城乡保护实践

阮仪三先生持续将研究和实践相结合，基于他渊博的知识和执着的精神，在保护实践中“一地一策”，深入现场调研，充分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因地制宜”，使保护规划落地，并将规划、设计、旅游产业、民生保障和政策机制融合在具体的保护实践中。在周庄古镇、西塘古镇、乌镇古镇、上海里弄、上海新场古镇、绍兴历史文化街区、苏州平江历史街区等诸多保护规划设计和保护实施工程中，他持续跟踪多年，亲历遗产现场，对设计施工人员、居民群众、领导和管理部门悉心讲解、耐心辅导、言传身教，有效地传播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方法。

### 3、意义与启示

阮仪三先生的城乡活态遗产保护学术思想是我国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宝贵经验，对研究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发展的中国路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归纳起来有三个

坚持保护与民生结合。活态文化遗产的社会性和生活性要求我们要更加关注居民的需求和社区的延续发展,通过历史建筑等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将保护与更新相结合,将保护的观念和要求融入城市更新,充分保障民生需求,完善公共服务和居住环境,使当代的功能在历史文化环境中有序生长,保持生活的烟火气,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坚持保护策略的因地制宜。活态文化遗产的地域性和文化性要求我们在第一步制定保护规划中首先深入理解不同地方的历史文化价值特征和内涵,特别关注当地居民的传承观念和方式,不处处复制统一的体系和内容。在保护规划实施中注重当地人的力量,建立由当地人为主的保护机制和政策,鼓励当地人保护传承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我国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

坚持保护与传承的统一性。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文化的可持续传承,应该将活态文化遗产资源整体纳入空间规划和城乡发展的资源要素体系中,通过保护规划将每项保护行动与人文资源的发掘、人文空间的营造以及日常社会经济活动融合在一起,并通过各地各类政策机制的适应性支撑和创新性扶植,将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有效结合,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好家园。

## 新征程上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中国路径

### 张兵(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

#### 1、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和贯彻党中央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要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强调自然保护地作为重要的自然遗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要求“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对各类文物本体及环境实施严格保护和管控”。2020年9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要求“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构建系统完整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要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202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明确无论陆域和海域,要彰显国土空间的文化与自然价值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要求,为新征程上文化遗产事业发展、为保护利用的理论技术探索明确了总体的政治方向。

#### 2、关于国土空间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作为我国首部“多规合一”的国家级国土空间规划,明确了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保护传承利用城乡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彰显国土特色的政策和总纲,强调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丰富多彩的景观资源是魅力国土的重要标识,是支持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战略资源。整体保护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构建国家遗产保护空间体系,增强文化遗产环境安全韧性,健全历史文化遗产空间保护的政策机制,系统活化利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这些政策要求目前在各省级和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得到进一步的传导和明确。

“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事业中,整体上从“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出发,加强与相关部门协同,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作用,过去几年的探索主要展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体现“新理念”,即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承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强调所有文化与文明都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制度的过程中,在划定“三区三线”,明确城市化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主产区基础上,识别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地区,从区域层面为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提供政策保障。

二是采取“新手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重要指示精神,抓紧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将历史文化资源的空间信息纳入其中,同时通过与调查、审批、土地供应、执法督察、不动产登记等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式推动国土空间规划治理方式的变革。

三是探索“新对策”。聚焦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践的空白领域,着重研究如何增强遗产地的国土空间韧性,以应对复杂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威胁。2021年在我国福州召开的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发表了《福州宣言》,重申须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加强在环境、经济,促进公正、和平和建设包容性社会等可持续发展不同领域的全球合作,将其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有机融合,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福州宣言》指出了遗产地面临的风险包括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退化,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和其他负面影响,要采取综合性方法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地,通过促进形成人与自然新型关系来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过去几年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中,有不少遗产地的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广泛吸收多专业的研究成果,因地制宜地研究提出了提高遗产地韧性的措施。

四是尝试建立“新机制”。在国家、省、市域层面,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全域全要素统筹的积极作用:“区域统筹”,打破行政界限,突出地域文化和自然价值,统筹制定跨区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周边景观风貌、自然生态环境等协同保护措施;“城乡统筹”,引导文化遗产保护由“点”上保护转向城乡一体的区域



性、关联性、整体性保护；“陆海统筹”，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使航道、锚地等设施布局合理避让水下文物保护区，切实保障水下文物安全，强化遗产分布密集的岸线区域、传统海洋生产活动区域、水下文物保护区及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海域整体性保护；“地上空间和地下空间统筹”，结合地下文物的分布范围、保护利用要求等，整合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地上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与地下空间的保护利用，地下空间开发规划布局涉及历史文化遗产的，应开展可行性研究和工程施工论证，尽可能避让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等本体较脆弱的遗产类型，实现地上地下功能空间的协调。结合城市更新等领域的规划和土地政策，在基于原有建成环境保护的规划路径基础上，不断加强土地政策与规划的深度融合，确保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规划实施更具实效，例如充分运用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政策手段，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践中盘活存量，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在当代的价值，使城市空间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掘和释放。

回顾2005年国务院成立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书》的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古代遗产延伸至近代遗产和当代遗产，保护的空間范围扩展到市域城乡全部乃至区域，保护的對象引入了工业遗产、20世纪遗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更加丰富的遗产类型，保护规划工作者有关遗产的时空观念实现了一次重要突破。今天，在加快建设生态文明体制、深化“多规合一”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能力建设也同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需要面向遗产保护利用的共同未来，发挥各方面的工作优势，加强合作，协同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

## 阮仪三先生的六大功绩

### 吴志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阮仪三先生在1981年暑假，选了我们78级的4位同学和77级的同学一起到山西平遥，去做古城保护规划和设计。这一次实践使得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古城丰富的遗产，从内心中建立起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说是旧城保护价值观的建立，另一方面也让我直接感受到山西历史文化古城保护的紧迫性，尤其在政策上、技术上、资金上和人员上的迫切需求。因为有了这段平遥古城的保护历史，不仅是和这些77、78级同学终身成为好学友，更是对阮仪三先生执着投入于历史文化保护的热情，以及内生性的动力有了发自内心的尊敬。

可能在社会上都认为阮仪三先生是位斗士，实际上，阮先生不仅是一位斗士，就我对阮先生的四十多年的学习，我觉得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完成了开拓性的、有历史意义的六大功绩。

一是挖掘了一大批城镇的历史史料，尤其是在县志和市志中摘录了大量的第一手笔记。在1980年代的城市规划学刊（当时称为《城市规划资料汇编》）经常有1—2个版面的原始县志学习记录笔记的刊登，系统性总结城市史料的先河，激活了一大批

城市建设史料；后来有了今日的全国县志集的集成出版，这是这一条学术线发展至今的集大成，是从县志、市志的资料挖掘的一脉相承，有力地保护、提炼了我国的县志历史资料，实际上是开拓了中国城镇文化遗产县志札记整理方法。

二是从平遥开始，阮仪三先生没有辜负陈从周先生对他的引入和培养，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城市大规模转型发展的历史阶段，成为城市历史保护的一面旗帜，在同龄人中成为卓有功勋的学者。阮仪三先生的“刀下留古城”的声音成为许多旧城拆迁中的一道强有力的威慑，使得多少城市在要拆除老城的最后一刻改变了决策。如福州三坊七巷，是福州成为中国唯一获得首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的理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

三是培养了一大批历史保护人才，成为我国历史保护界的骨干力量。阮先生在历史文化保护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城市历史保护的专家，并产生了国际影响力，如张松教授、邵甬教授、周俭教授以及他们培养的一批学子，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保护学界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既知道世界目前最新的文化保护趋势，又理解中国特别的需求并与本土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创新结合。

四是培育了一大批历史保护专业队伍，包括基金会、研究中心、专业团队等，保证了我国历史城镇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阮仪三先生建立、培养和建构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方阵是一个系列集团，除了学术研究外，还有基金会、规划设计院、各地研究中心中的骨干，一个立体的、复合的覆盖国内外的生态网络逐步形成，这是区别于传统的个体学者的时代创新。我在平遥参加了阮仪三教授创新中心的成立，更让我看到了这个生态群落扎根在祖国大地的强大生命力。

五是凝练了一套古城保护理念、工法和方法，是历史保护事业的精髓，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的历史文化保护事业不仅是概念上的、理论上的，更是技术方法上的突破。我在湖南和贵州的一些村镇保护中看到了阮先生发起的大量的历史古镇和古村保护夏令营，每年组织了研讨会、从木工操作开始的工法实验、人才培养、技术方法的凝练，这是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非常难能可贵的不断凝练和地方特色的规范建立。在纯物质加工保护技术的同时，还有在历史保护中的一些技术规范、法律文本和操作手册、程序规则的形成，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这些都需要继续进行系统化整理。

六是铸造了“仪三精神”。阮仪三教授不仅是一位保护古城镇的斗士，更对各类优秀文明怀有强烈的挚爱，对学生怀有真挚的关爱，对学问怀有纯真的热爱。阮先生在外经常给人以斗士的形象，实际上都是他对于历史遗产、对于青年学子、对于真学问的大爱，凡破坏了历史遗产、凡碰到了对青年学子的贬损、凡见到了对学术的亵渎，他都会拍案而起，大家应该理解这是阮先生大爱精神的所致。没有这种大爱就不会有这种疾恶如仇的拍案而起，阮仪三先生的三个大爱精神，外在表现出的才是三个呵斥声。